

外婆的越剧简史

■周含

比起嘈杂的环境，我更愿意在电视机前看越剧电影《五女拜寿》。这部电影集结了茅威涛、何赛飞、何英、方雪雯等当年浙百的最强小花，和泰斗级编剧顾锡东老师。当然这些小时候都不明白，只是跟着外婆一起看得如痴如醉。印象深刻的很大原因，可能是外婆说扮演杨继康的董柯娉，也是象山人。

里面台词风格，有趣带劲。比如——翠云说，三姑爷可不像绣花枕头一包草，时来运转必中状元。

夏莲说，他中状元，你挖掉我一双眼睛。

翠云说，你敢打赌。
夏莲说，你看中这个叫花状元，给他做小老婆好了。

网感一应俱全，就算放在今天看，写得也是十分精彩，难怪会成为越剧电影的一代经典。

外婆说，这样的越剧电影每天可以看个10遍。我觉得这个故事就算不是越剧，也是很好看的，还因为越剧，电影才更好看了。多年后在KTV点歌，我还会翻到无人问津的戏曲，找到《奉汤》选段，播一播原声，暖肚汤一喝，一秒回到小辰光。江南基因传承至此，也明白了为什么《新白娘子传奇》的戏曲范儿如此受喜爱。

台词解决不了才子佳人的困惑，必须眼波流转，娉婷袅娜起个范儿，荡气回肠唱上一段，才能明白此时此刻，情绪指数已经爆了表。

越剧好像也解决了影视审美的统一，从小对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不管戏里戏外，都觉得毫不违和。所以后来看到《新白娘子传奇》叶童扮演的许仙，也能完全入戏。甚至，这种女班的配置，更有一种传统美学的和谐力和古朴感。

真是吾辈之幸。

三

2015年的某一天，我在办公室突然哼唱了《一鸟九命》主题曲的第一句“一只小黄雀”，对面坐着前来

挂职的黄朵朵妹妹，瞬间秒接了一句“害了九条命”。我们两个大眼瞪小眼看着对方，愣了足有三四秒，最后，猛地爆笑出来。这场景，基本属于“多年失联的战线同志突然记起了接头密语”，或者是“苦练神功不成的愣头青灵光乍现了某句咒语”，总之那瞬间，真的可以回忆一辈子。

对于越剧电视连续剧的集体回忆，也许只有浙江“80后”才有记忆保存。浙江电视台在20世纪90年代拍了很多“很浙江”的电视剧，越剧就是其中的选项。

除了《一鸟九命》，我还特别喜欢《天之骄女》，其中王滨海老师扮演的高阳公主，让我叹为观止，她把公主的刁钻霸道偶尔又单纯直接的复杂形象演活了，那时候恨不得伸手进电视机“扭”她的脸。另外还有李丽老师扮演的燕娘，不卑不亢，又聪明又稳重，也让人多年难忘。

可惜那段时间，老年戏迷对艺术的追求不那么狂热了，爱看越剧的外婆被身边的麻将朋友吸引了。外婆和我对越剧的热爱，差距越来越大，我也开始问外婆，以后都不看戏文了吗？

外婆一放筷子，义正词严地回答：“等我百年之后，你们记得给我带一盒（咽了咽口水）麻将去！越剧怎么带啦？要么……只有我在那边等越剧十姐妹来做戏文嘞！”

外婆真是一个狡猾的戏迷。
外婆不知道，我早就过上了磁带生活。1995年，我在Walkman里塞入一张《滑稽越剧哈哈笑》，以掩饰爸妈以为我在认真听的人教版“英语听力”，可实在控制不了某些时候笑出猪叫声。

“怎么英语就这么好笑吗？”所谓滑稽越剧，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喜剧开始大行其道，有人把滑稽戏和传统越剧嫁接在一起，如果说是艺术品种，那是既独特又流行。

不得不说，我爸还是紧跟时尚，抢到了这盒盒带《滑稽越剧哈哈笑》，当时基本等同于刀郎演唱会那种热度。

之后家里还买了《王老虎抢亲》《马屁精》（其他记不清了）新专辑的VCD。我记得在滑稽版《问紫娟》里，宝玉还是按照传统唱段问道：“妹妹的书稿今何在？”滑稽版紫鹃是吸了一口气，大声说：“鞋子袜子皮鞋鞋盖，牙刷牙膏梳妆台，通通被我卖特卖啦哉！”

有次吃饭，我向外婆哼唱了这段。她停下咀嚼，皱着眉头看着我，想了良久才说：“林黛玉啦要爬出来哭嘞！”

四

外婆在2014年就走了。最遗憾的是，答应了外婆陪她在剧院看一遍《梁祝》，没能实现。越剧十姐妹有好几个比她走得还晚，外婆失算了。麻将好像也没带，我也记不清了，外婆其实还不知道，我已经会唱好几个选段了。《沙漠王子·算命》是我第一个学会的选段。原因挺简单，男人也能唱得那么好听。

多听了，尹派那种柔中带刚的感觉十分入脑，比起徐派、张派那种高亢，尹派甚至有种通俗唱法的轻快感。尤其是最后一句“无意之中遇公主，公主的芳名叫伊丽”，这种回旋镖式的唱词，生生听出了一股爽剧的氛围来。

《何文秀·桑园访妻》是我第二个学会的选段。最早因为馋食体质，被唱词中的报菜名深深吸引：“第一碗白鲞红炖天堂肉 第二碗油煎鱼儿扑鼻香 第三碗香蕈蘑菇炖豆腐 第四碗白菜香干炒千张 第五碗酱烧胡桃浓又浓 第六碗酱油花椒醉花生”

十来岁的小人，谁能抵挡住这香喷喷的大碗菜，我问外婆：“什么是天堂肉啊？”外婆说：“就是西湖旁边的猪。”我百思不得其解，问：“为什么西湖旁边的猪就是天堂肉了？”外婆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惜，我从来没见过西湖旁边的猪。

如今已是2025年了。



风吹麦浪

胡龙召 摄

一杆珍贵的秤

■杨崇兴

“我常用这杆秤来称粮食，邻里之间的互助与分享，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微笑着，眼中流露出一丝怀念。那时的邻里关系，如同这杆秤般简单而纯粹；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温暖，在秤的摇摆中悄然流淌。朋友的家境并不富裕，但他总是乐于分享，哪怕是一小袋米、一把豆子，都会被 he 称量得恰到好处，送到邻居家中。他的慷慨与善良，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仿佛每一份分享，都在秤的两端找到了平衡。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朋友微笑着，眼中流露出一丝感慨。“我们总是在不断地衡量，权衡得失，追寻那份心灵的平衡。”我点头称许。秤不仅是物质的衡量，更是情感的寄托。它教会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公正与清明。

杆秤虽小，却蕴含着无尽的哲理与智慧。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选择的困惑时，都会想起它。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利益冲突，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像这杆秤一样，保持内心的坚定与公正。生活的意义，

不在于追逐名利，而在于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我将这杆秤小心翼翼地放在门后，时常抚摸、擦拭它，感受着它传递给我的力量。朋友的馈赠，让我明白，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如何在拥有中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公正。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独坐书房，思索着如何理性识别人间万象，如何正确权衡利弊得失。当看到这杆秤时，心中对人生的信仰与追求，似乎又有了新的感悟。

在我与朋友的交流中，常常提到生活中的各种选择与挑战。朋友曾说：“生活就像这杆秤，有时我们会面临不同的选择，必须找到那个能让我们内心平衡的点。”他的话让我受到启发，深感生活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自我的审视与对价值的重新定义。

记得曾在工作中遇到一位性格强势的同事，他做事的方式让人感到压抑与不适。起初，我克制着迎合他的意图，然而却发现，这样做只会让我内心更加不安。于是，我开始反思，是否应该像杆秤那样，

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我主动与他沟通，表达想法与感受。最终，双方解开了心结，达成了默契。这次经历让我明白，生活中的每一次冲突与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更是对内心平衡的重新寻找。

岁月如梭，转眼间，我的朋友在深圳生活多年，早已成名成家。尽管相隔千里，我们始终保持联系。每当我接到他的来信和电话，亲切与温馨在心中油然而生。这份情感，如同这杆秤，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始终相连。

多少年来，每每看到这杆秤，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工具，更是我人生的信仰与追求。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辛，我都将带着这份“秤之情”，勇敢前行，追寻内心的光明与真理。

这杆珍贵的秤，在我心中扎根，成为我生活的指引与动力。在这繁华的尘世中，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杆属于自己的秤，守护内心的公正与温暖，勇敢坚毅地追寻心灵的归属。

聆听时光的回响

■简平

那晚的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灯光如星河倾泻，宁波交响乐团亮相“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邀请展演”，一场精心编排的《逝去的时光》音乐会展现了乐团在西方经典与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之间的卓越驾驭能力。

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两部北欧风格作品与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二胡协奏曲《逝去的时光》，被乐团以截然不同的音乐语言诠释了“时光”这一永恒主题，既展现了西方交响乐的厚重与壮美，又呈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深邃与哲思。

西贝柳斯的《图涅拉的天鹅》和《降E大调第五交响曲》虽风格迥异，却都承载着北欧文化特有的苍茫与神秘。当指挥杨洋的双手轻轻抬起，宁波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以精准的音色控制和层次丰富的演绎，将听众带入西贝柳斯的音乐世界。《图涅拉的天鹅》描绘了北欧神话中冥河图涅拉上徘徊的天鹅，象征着死亡与永远的静谧。乐团在演绎时展现出极强的音色塑造能力，低音弦乐从深处浮现，以微弱的持续音铺陈幽暗的水域氛围，木管组冷冽的音色勾勒出北欧寒夜的孤寂。英国管独奏的音色空灵又略带哀伤，仿佛天鹅的吟唱在冥河上缓缓飘荡。指挥杨洋对乐曲的呼吸感把握极为细腻，让音乐在极弱与渐强之间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听众仿佛置身于北欧神话苍凉和幽冥的意境之中。

相较于《图涅拉的天鹅》的沉郁，《降E大调第五交响曲》则展现了对生命与自然的壮阔礼赞。宁波交响乐团在演绎这部作品时，展现出强大的动态对比与结构掌控力。第一乐章中，圆号奏出的音乐动机坚实、庄严而宽广，弦乐则以精确的节奏支撑起音乐的推进能量，以西贝柳斯的“音块移动”技法，使不同乐器组之间的音色过渡自然流畅，如同北欧广袤森林中的光影变幻。乐团准确捕捉了西贝柳斯音乐中特有的“有机生长”感，使乐句的推进如自然万物般生生不息。终乐章的“天鹅颂”主题以铜管的辉煌与弦乐的交织赋予音乐壮丽的史诗感。乐团对西贝柳斯特有

的和声色彩与节奏张力的把握十分到位，使整部交响曲在严谨的结构中充满了澎湃的生命力。

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二胡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以古曲《梅花三弄》为旋律基底，通过现代作曲技法与二胡的独特音色，探讨了时间、记忆与文化的流逝与重构。宁波交响乐团在演绎时，既保持了原曲的文人气质，又赋予其当代交响乐的宏大叙事。特别是在作品中部激烈的赋格段落，乐团与二胡形成多层次的竞奏，仿佛不同时代的音乐记忆在同时时空碰撞。

二胡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陆轶文的演奏极具感染力，她以二胡特有的滑音、揉弦和微分音变化，赋予音乐浓郁的东方韵味。在乐团的协奏下，二胡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激昂奔放，既能以近乎无声的弱音营造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又能在高潮段落爆发出惊人的力度与情感强度。尤其在华彩部分，她的技巧与表现力令人叹服。乐团在伴奏时展现出极高的敏感度，弦乐以极简的重复音型模拟古琴的泛音效果，木管与打击乐则以点描式的手法与二胡形成对比，营造出时空交错的听觉体验，并在乐团精致的和声背景上勾勒出时光流逝的轨迹。杨洋的指挥使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东西方乐器的交融，更在音乐语言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深层沟通以及诗意碰撞，让听众在熟悉的东方旋律与西方古典音乐之间引发对时光流转的感受并找到情感的共鸣。

宁波交响乐团在这场音乐会中，既展现了他们对西贝柳斯作品的深刻理解，又成功诠释了陈其钢作品中的东方哲理。西贝柳斯的音乐如北欧的冰川，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流动；陈其钢的《逝去的时光》则如中国水墨画，在留白与写意间勾勒出时间的循环往复。这场音乐会不仅让观众欣赏到音乐艺术的精湛，还让观众在岁月的褶皱中寻找永恒。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余音仍萦绕耳畔——那是时间的声音，是记忆的回响，也是音乐超越时空的魅力。

泥土的印记

■杨军

四月底的晋东南，黄土高原的褶皱里藏着一一种倔强的绿。我来到晋城往西40公里的沁水县，车轮卷起的尘土在阳光下形成一道淡金色的帷幕。此行的目的地是尉迟村——那个以唐代大将尉迟恭命名的小村庄，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赵树理故乡”，如今的“树理小镇”。

村口的石碑已经斑驳，“人民作家赵树理故里”几个红漆大字褪色得近乎温柔。石碑旁蹲着几位老人，他们的皱纹里嵌着黄土，眼神却明亮如沟壑间的溪水。听说我是来寻访赵树理足迹的，一位缺了门牙的老汉突然笑出声：“树理啊，俺们叫他‘老赵’。他儿媳妇还住在老屋里。”这亲昵的称呼一下子消解了我心中那个被供在文学神坛上的作家形象。

赵树理故居是典型的晋东南民居，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围成一个方正的天井。西厢房内，一张坑坑洼洼的木桌上摆着盏煤油灯，玻璃罩上还留着烟熏的痕迹。据说这就是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地方。我凝视着那张不过三尺见方的桌面，想象1943年的冬夜，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文人如何呵着冻僵的手指，在如豆的灯光下勾勒小芹和二黑的面容。墙角堆着几件农具，锄头的木柄被手掌磨出了包浆——原来他真如传闻中一样，写作之余常下地干活。

在尉迟村，文学不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村委会门前的黑板上，用粉笔画着《李有儿板话》的人物谱，歪歪扭扭的笔迹显然是孩童所为。“树理小剧场”正在上演根据《小二黑结婚》改编的沉浸式戏剧，舞台上的小芹、二黑、二诸葛、三仙姑，活脱脱一个个从赵树理笔下，来到观众眼前。村书记告诉我，根据赵树理作品改编的舞台剧有很多，剧中的角色已经成为了大家眼里最熟悉的“乡亲”。

近晌午，我在赵树理的老屋前遇见吕美赛。她是赵树理的三儿媳，今年七十七岁，记忆却清晰得惊人。“爹从不摆作家架子，”老人眼里闪着光，“写作用的笔、种地用的锄都是他经常用的。他说写作像种地，得知道泥土的脾气。”

尉迟村的泥土确实特别，我抓起一把在掌心揉搓，那土呈现一种少见的赭红色，细腻中带着沙质。村里人说这是长庄稼的“金土”，也是出故事的“灵土”。赵树理小说里那些鲜活的口语，什么“小腿疼”“吃不饱”，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方言。现在村里人说话仍带着那种特殊的节奏，比喻永远和农事相关，“那人精得像田亩的锄头”“这事黄得跟早了的谷穗似的”。

黄昏时分，我爬上村后的虎头山。夕阳给层层梯田镀上金边，远处传来高亢的上党梆子声。六十年前，赵树理就是站在这个位置，看着合作社的社员们扛着农具归来，构思出《锻炼锻炼》里的集体劳动场景。此刻山下的尉迟村炊烟袅袅，新修的柏油路边立着太阳能路灯，但田间劳作的姿势与半个世纪前并无二致。

夜幕降临，村委会前的空地上聚起休闲的村民。几个后生用手机播放着《三里湾》的有声书，听到精彩处，老人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当年真实的故事”。文学在这里不是高悬的明月，而是融入泥土的养分，一代代生长出新的故事。

离开尉迟村时，我的鞋缝里嵌满了红土颗粒。这泥土的印记，或许就是赵树理文学最真实的注脚——不是俯瞰众生的姿态，而是躬身入局的温度。当车驶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忽然明白为何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总带着土腥味：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棵把根须深深扎进晋东南黄土里的树。